文化溯源

周口大板桥的百年低语

崔中玉

在周口，贾鲁河上的大板桥与二板桥，总裹着几层说不清的故事。无论其初建位置、承建人，或是名字的由来，都像河面上流动的薄雾，带着几分神秘，又引人遐想，等待着岁月的阳光将其一一驱散，还原历史的本来模样。

1992年，《周口文史资料》第九辑里，理育先生的《二板桥的传说》讲了大板桥的缘起。明万历年间，贾鲁河西十多里的金盆李寨，有位叫李万卿的智者（乡邻都称他“李老万”），为了乡亲们赴陈州府“完粮”方便，就在贾鲁河口北一里处架了座木板桥。木板又宽又长，大伙儿便顺口叫它“大板桥”。后来，同村的李老忍心里不自在——大板桥总让李老万先过，于是在大板桥南半里，也搭了座木板桥。两座桥并肩卧在水面上，像一对孪生兄弟。文人们见了，随口吟出“大板人如潮，二板我独行。乌云遮半天，皆阴（结姻）我有晴（情）”的句子，“二板桥”的名字，就这么传了下来。

清代的周家口，一半属商水，一半属淮宁。这两县的旧志里，该有大板桥、二板桥的痕迹吧？但笔者翻遍顺治《陈州志》、顺治《商水县志》、康熙《续修陈州志》，都没能找到。直到乾隆年间，“永宁集大板桥”才悄悄出现在志书里。乾隆十二年《商水县志·关津桥梁》写道：“永宁集大板桥，小黄河入沙河处，县治东北十八里。”乾隆《陈州府志》里也有相同记载。这里的“小黄河”，就是贾鲁河；里面的“永宁集大板桥”，便是后来人说的周口大板桥，是当时商水县50座桥梁里的一座。可志书里没说大板桥是啥时候建的、谁建的。

直到民国七年的《商水县志》，才算补上了这段。该志卷二十《人物志》里，根据李氏家谱补了《李桂芳传》：“李桂芳，字月樵，例贡。家素封雅，敦义礼。父和春尝捐千金，修周口板桥。桂芳承先志，岁有补葺。雍正元年，河决荥阳，水南驶西华，诸河泛溢，渚水尤险。桂芳躬率仆、佃，伐庄柳数百株，草钜万斤，增高培薄，堤防完固，乡人赖之。四年饥，凡亲、佃积欠，累千余金，悉焚其券。又于东马坡立漏泽园。以招集临潼流民，授知县，未仕而卒。”

按这种说法，周口板桥是李桂芳的父亲李和春捐了千两银子修建的。李桂芳是清代商水人，乾隆《商水县志》说他是“例监，候补知县”；民国《商水县志》引《李氏族谱》，又说他是雍正年间的“例贡”，因招集临潼流民，被奖了个知县头衔。这里的“渚水”，就是颍河。从李桂芳“伐庄柳”加固颍河堤岸来看，他家该在商水沙河以北的颍河岸边。明清时，商水和西华不是以沙河为界的——沙河以北直到颍河岸北，还有商水的地盘，商水县在那儿设了“东西马坡地方”，管着62个村子，1940年划给西华县。如今，西华县李大庄乡政府的所在地，当年就属商水。那一带沙河以北、颍河两岸的三角地带，有李大庄、李集（旧称林川集）、李桥、李庄、李小庄、李寨这些李姓村子。它们和永宁集同在商水沙河以北，离得很近。李和春捐钱修周口板桥，倒也合乎情理。

那乾隆十一年《陈州府志》里，李桂芳又是啥样的？笔者查了查，《选举志》里没他，卷之十九里却有《李桂芳传》——不过没放在商水县条下，反倒归在了“西华县孝义”里。内容差不多，只是把“周口板桥”改成了“周口北桥”，也没提“例贡”一事儿。

若按《陈州府志》，李桂芳该是西华县人。再翻乾隆十九年《西华县志》，卷之六《选举志·职监》里写：“李桂芳，考授县丞，援例知县。”这和乾隆《商水县志》里“例监，候补知县”的说法倒也接近。《陈州府志》的《选举志》没设“例监”“职监”，但“例贡”里也没李桂芳，看来《李氏族谱》说他是“例贡”，或许是把“例监”说得体面了些。可民国《商水县志》还是照着族谱，把他归进了“例贡”。

商水县东西马坡一带，夹在西华、商水、淮宁三县之间，村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是常事。那时候，在哪儿上学（做庠生），就算哪儿的人。李桂芳既被《商水县志》记载，又被《西华县志》收录，倒也不奇怪。民国《商水县志》里，李桂芳的孙子李树仁还被算成淮宁人，李郡的曾孙李钟璧、李钟瑜俱恩贡入淮宁籍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所以，乾隆西华和商水旧志里的李桂芳，该是同一个人。

按乾隆《商水县志》的说法，李桂芳的儿子李郊是商水的例监，在商水捐过义学的学费、修过漏泽园、捐过麦种，做了不少好事。这些事，乾隆《西华县志》里反倒没提。看来从李桂芳起，李氏家族的活动范围，主要就在商水了。

既然周口板桥是李桂芳的父亲李和春修的，旧志里对李和春又有啥记载呢？乾隆十九年《西华县志》卷之八《义行》里，有李和春和父亲李瑞的传记，说李和春活到85岁。这篇传记和谢以庆、金楫、王经道、张善治的传记，后面备注了“以上采访”四字，是乾隆十九年搜集的资料，看来李和春是第一次被写进《西华县志》。乾隆《西华县志》里写道：“康熙二十五年，春于周口集小河口捐银千余两，设板桥一座，以便行者。”这和《李桂芳传》里“春尝捐千金修周口北（板）桥”的说法，正好对上。这么看来，周口大板桥是康熙二十五年修的，位置应该在贾鲁河口。

周口板桥修好后，维护也是件大事。按乾隆《陈州府志》和《商水县志》的说法，雍正年间，李桂芳“承先志，岁有补葺”，一直管着板桥的维修。可到了乾隆四年，一场大水，让周口板桥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

乾隆《陈州府志》卷之十八《李震普传》里写道：“李震普（字布青），贡生，候选知州……所居西马坡南临沙河，北临渚河，周围二十余里，居民千余家……乾隆四年，临河堤岸暴水冲决，时震普病笃，仍命子弟辈如前料理，赖以保全。又修周家口板桥一座，黄家冲草堂两处、石桥二座，行人便之。”

乾隆《陈州府志》里的《李震普传》附在商水县名下，乾隆《商水县志》里也有他的传，还说他“乾隆十一年从祀乡贤”，可见李震普是商水人。只是县志里的内容更简略，没提他住在哪儿、修过周家口板桥这些事。

按《商水县志》的记载，李震普和李桂芳该是近门亲戚。该志卷之八《诰敕》里说“赠候选通运判李郊父李桂芳”，卷之三《义学》里说“乾隆五年震普殁，其弟震兴，堂弟郊，堂侄树勋，复继其志焉。可谓富而好礼者矣”。民国《商水县志》根据李氏族谱补的《李郊传》里，又说李郊“从兄震兴”。李震兴、李震普都是李兰禧的儿子（见民国《商水县志·李兰禧传》），他们和李郊的关系，一会儿说“堂弟”，一会儿说“从兄”，词儿虽不一样，至少能证明是本家。李桂芳该是李震普的族叔。乾隆年间，李郊还编过《李氏族谱》。李震普“所居西马坡南临沙河，北临渚河，周围二十余里，居民千余家”，而金盆李寨就在西马坡，李桂芳家也在东西马坡一带。这么看，他们或许都是从金盆李寨走出来的族人。

乾隆和民国《商水县志》里说，东西马坡的李氏家族有“富而好礼”的传统，好几次被县令表扬。乾隆四年，李震普捐了一百多两银子，给商水的义学请名师教书。第二年他去世了，李震兴、李郊、李树勋接着把义学办了下去。李和春修了周口板桥，儿子李桂芳“承先志，岁有补葺”。这些事，都印证了这个传统。乾隆《陈州府志·李震普传》里还说“督抚及诸当事屡题额，旌其门”，可见李氏一族确实做了不少好事。乾隆四年，临河堤岸暴水冲决，李和春、李桂芳所修板桥可能被彻底冲毁了（《三川记忆》也说乾隆初年桥被冲毁），所以李震普才“修周家口板桥一座”。李氏向来“富而好礼”，古人又讲究“为善不终，与不为等”（见乾隆《陈州府志》），李震普接着先辈的传统重修板桥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李震普修桥之事不见乾隆商水旧志，仅见《陈州府志》，或许是因为李郊、李郡、李树勋、李淇、李汉这些李氏宗亲，都参与了《陈州府志》的“襄刻”（协助编纂刻印）吧。

周口板桥在小黄河口，水宽流急，非得“木大板长”才能架起来，所以才有了“大板桥”的名字。乾隆《陈州府志》和《商水县志》里说的“永宁集大板桥”，就是它。相传，它在贾鲁河口北约70米，正对着顺河街。乾隆十一年以前，周口就这一座板桥。那时候，周口的三寨还没建，永宁集和周家口早就分不清你我了。所以，《李桂芳传》里叫它“周口北桥”，《李氏族谱》里叫“周口板桥”，《李震普传》里叫“周家口板桥”，《李和春传》里叫“周口集小河口板桥”，《商水县志·关津桥梁》里叫“永宁集大板桥”。乾隆《陈州府志》里，周口贾鲁河上也只有这一座桥。这么看来，名字虽多，其实是同一座桥。从最初修建，到后来的维修、重修，都是商水县东西马坡的李氏一族在操心。

至于周口二板桥，却是另一回事，道光《淮宁县志》里有记载。该志卷之十九《人物传》所云“孔兴铣，乾隆二十七年修虹济桥”，指的就是它。卷之三《疆域》里也写：“虹济桥，在城西南五十四里周家口，俗名二板桥，通贾鲁河。”它大概在大板桥上游200米处。这说明二板桥就是虹济桥，和那座有名的大板桥，本不是同一座桥。

乾隆十一年时，周口大板桥还在，所以乾隆《陈州府志》和《商水县志》都有记载。而虹济桥（也就是后来的二板桥），是在乾隆修志之后才动工的。这就解释了为啥乾隆十一年《陈州府志》、乾隆十九年《淮宁县志》里均没提虹济桥，直到道光六年的《淮宁县志》，才有了虹济桥（二板桥）的记载。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年间，大板桥和二板桥或许一起立在河上，承载着东来西往的行人、货物，于是才有了“大板”“二板”的区别。

大板桥在贾鲁河入河口，水又宽又急，修起来本就不易。二板桥建好后，大板桥有了替代，就算塌了，重修的事也没那么急了。这座曾经热闹的古桥，最终还是被岁月湮没了。可它到底啥时候塌而未修的，旧志里没说。

光绪十三年，黄河决郑州，周口北岸尽成泽国，二板桥也被冲毁，商水人李华（字春圃）复出资重修。到民国时期，周口贾鲁河上就只剩二板桥了。民国《商水县志》里写道：“小黄河桥一座：二板桥，城北十八里周家口。《陈州府志》有永宁集大板桥，小黄河入沙河处。”写二板桥时，只轻描淡写提了句大板桥。